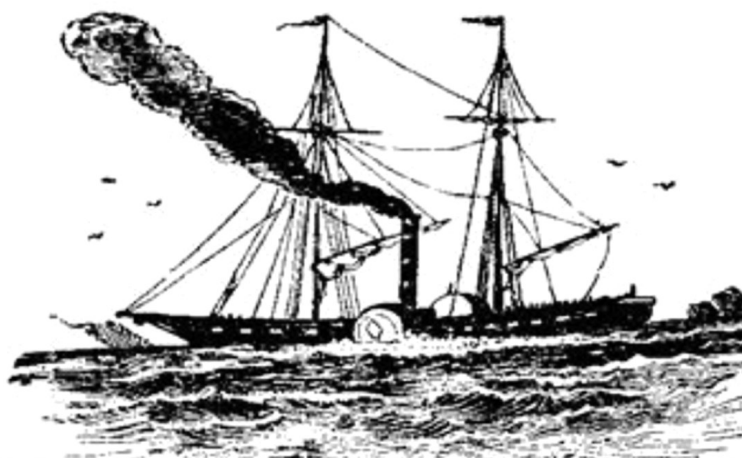


威林密号轮船

吴悦 文/图



1893年《画图新报》第14卷第2期刊载的海外火轮船图

曾国藩驻守安庆期间，安庆成为湘军的大本营。曾国藩一面设置安徽善后总局和安庆粮台，作为地方后勤保障机构；一面创设由徐寿、华蘅芳等技术专家组成的安庆内军械所，发起了以制炮造船为核心的洋务运动。

在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船于安庆下水试航之前的同治元年（1862）初，曾国藩委派幕僚周腾虎在上海购买了一艘名为“威林密号”的洋船。

威林密号与周腾虎

周腾虎（1816—1862），原名瑛，字弢甫（一字韬甫），阳湖（今江苏常州）人。自幼即负才名，博古通今，雄于辩论，亦善诗词书法，因屡试不第，改习经世之学。咸丰五年（1855），周腾虎在江西入曾国藩幕，并推荐妻弟赵烈文同人曾幕，不久因丁母忧而回乡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十月，周腾虎来到安庆，再入曾幕。

驻守安庆期间，曾国藩注重招揽洋务人才，因此十分赏识周腾虎，认为他“颇习夷务，所言亦晓畅事理”。并让他搬到行署中同住，常常与其朝夕长谈，不久即派周腾虎赴上海催办粮饷，顺便觅购洋船。

一个多月后，周腾虎在上海选定了一大一小两艘洋船，分别名为“威林密”和“吧吡”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正月二十一日，他命威林密号洋船驶往安庆，请曾国藩“阅看定夺”。曾国藩登上轮船细细验看，慨叹“无一物不工致”，尤其是专门细看了“火激水转轮之处”，即轮船的蒸汽动力装置，只是“仓卒不得其要领”。但因周腾虎此前来信禀报的船价预算只有“二万或一万五”，曾国藩已据此致信上海道吴煦，令其按价购买。现在这艘船却索价五万五千金，与预算价目悬殊，因此命周腾虎购买只需一万二千金、稍小的“吧吡号”。李鸿章也和其他幕僚一起陪同曾国藩检视了威林密号，认为“甚为宏丽”，只是“索价太昂”，同时他也考虑到了轮船恐“暗有损伤”，建议周腾虎与吴煦商议妥当后再购买。

当时上海等地的洋商常常将二手旧船出售给中国官绅，威林密号和吧吡号都是这样的旧船，吧吡号的破旧情况尤为严重，船到手后才发现行驶迟缓，又没有洋人旗号，无法通过太平天国占领区，只能留在上海一带使用。李鸿章自同治元年（1862）三月率淮军人沪后，急需从安庆运送军火以及后续的淮军兵勇赴沪，于是顾不上昂贵的价格，写信请求曾国藩同意购买在安庆验看过的威林密号，而将吧吡号留在苏沪地区，专门在镇江、上海一带使用。

同年二月，江苏巡抚薛焕命人乘吧吡号解粮饷到浙江，不料船于中途损坏，未能及时送到。曾国藩也因此遭到了朝廷的斥责。威林密号虽然较吧吡号稍好，但也时常损坏，修理费动辄千金，且雇用的洋人不听调度。李鸿章因此责怪周腾

虎办事不力，“此等人浅谈甚高，未可出手办事”。

周腾虎个性好辩，到上海后不久，即得罪了上海官绅，再加上他欲为有“通贼”嫌疑的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洗冤，屡被弹劾，同治元年（1862）六月间，两次遭到廷寄斥责。周腾虎本就因轮船之事以及李鸿章的责咎而忧心不已，听说两次被纠劾，更是“意甚郁郁，一病不起”，于同年七月病逝于上海。

曾国藩初接廷寄时十分愤怒，在家信中将周腾虎归为“有才而无德者”之流，在得知其遭弹劾实为上海官绅为泄私愤所致后才释然。他对于周腾虎的病逝十分惋惜，在致赵烈文的信中写道：“韬甫潦倒半生，遽埋玉树。人世泛泛悠悠之口，乃能枉杀磊磊落落之才，足为扼腕。”

而李鸿章始终将轮船的不堪使用完全归咎于周腾虎，他认为周腾虎之死也有因轮船之事而负疚愧疚的原因，“韬甫抱屈而未始无愧恨于轮船。亦命也夫！”

威林密号与安庆蒸汽机船

彼时长江下游沿岸大多仍为太平天国占领区，只有外国轮船才能通过。曾国藩购买洋船，一方面是为了在安庆与苏沪浙等辖区之间运送军械、粮饷、兵勇及传递文报，同时也是为安庆内军械所仿制轮船提供参照的标本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徐寿的曾孙徐宝璠、玄孙徐梁曾根据父辈口述回忆，徐寿、华蘅芳等在安庆筹备制造火轮船时，曾登上一艘停泊于安庆江心的英国轮船参观了整整一天，绘制了很多船上机械的草图。后来，他们正是以此为参考，制造出中国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火轮船（《无锡文史资料》第7辑）。一年以后，那艘洋船的船长再次来到安庆并登上徐寿等人制造的轮船，当他听说这艘船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时，十分惊叹。

彼时安庆并非通商口岸，外国轮船不能在安庆江岸停泊。从苏沪等地来安庆，只能搭乘外国商船到安庆上游的九江，再从九江转乘中国民船到安庆。从安庆到长江下游地区同样也要从九江中转。徐寿、华蘅芳等登上的洋船不止一次在安庆江边长时间停泊，可以推断即为曾国藩自购的威林密号。

在与太平天国争夺安庆期间，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，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初步形成，他于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七月十八日上奏朝廷的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》就是其洋务思想的反映：

“购买外洋船炮，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……购成之后，访募覃思之士、智巧之匠，始而演习，继而试造，不过一二年，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，可以剿发逆，可以勤远略。”

进驻安庆以后不久，曾国藩首开洋务运动之先河，创设安庆内军械所，购买洋枪洋炮洋船，继而进行仿制。因此，曾国藩之所以购买威林密号，不仅仅是为了运解粮饷、军械、兵勇及传送文报，而是希望最终能达到成功仿制的目的。与妄图利用洋人，通过从西洋购买洋船的方式组建舰队并最终失败的清廷相比，曾国藩显然具有更清醒的认识。

当时上海的官绅利用地利之便，购买或租雇了一些洋船。因此，曾国藩在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》附奏的《请先调上海旧有轮船试用片》中提出：“南省旧有洋船二只。询据赫德则称，并非打仗之船，且已有一只败坏。……赫德所称一只败坏，想即系名‘可敷’者。……臣拟先调现泊上海之‘土只坡’轮船一只，由长江上驶安庆一带，就近察勘试用。”《清史稿》也记载：“以已租之美利坚轮船二艘，一名土只坡，一名可敷本，为护运之用，配以炮械，驶赴安庆，隶曾国藩调遣。”

因此，曾有研究者认为，安庆蒸汽机船是以土只坡号为标本制造的。但实际上，土只坡号最终并未调赴安庆。曾国藩的奏折写于咸丰十一年七月，但同治元年二月，总理衙门大臣奕訢在上奏朝廷的《迅速购买外国船炮折》中却明确记载：“前据赫德云，南省旧有二只，并非打仗之船，已经废弃，殊为可惜。”实际上，当时上海官绅购买的洋船远不止二只，为防止总理衙门调拨，勉强承认有二只，只是敷衍之辞。此时，曾国藩已经安排周腾虎在上海购船，并在安庆检视了威林密号，说明曾国藩确实曾有调用土只坡号到安庆的想法，但因沪方称船已废弃，最终未能如愿。

难以调度的威林密号

威林密号购定以后，由于中国极少有人懂得驾驶洋船，也不熟悉船上机械，只能雇用西洋人担任船主（即船长）及水手。而在当时积贫积弱、落后挨打的国情下，洋人在中国国土上飞扬跋扈，为所欲为，即使是曾国藩、李鸿章这样的朝廷大员，对待自家轮船上的西洋雇员，也常常束手无策。

同治元年六月，威林密号从汉口驶来安庆，曾国藩令其装载五千斤火药运赴上海，但洋人“贪带茶叶”，嫌火药数量太多，竟然将曾国藩派去的委员赶下船，“并不肯少待片刻以带信件”。自己购买的轮船竟然不能听命于己，曾国藩不禁慨叹：“凶悍至此，殊可虑也！”

一个月后，李鸿章欲令威林密号从上海押解四万两饷银赴安庆，同时搭载回籍募勇的魏荫庭等淮军将领至安庆中转。但威林密号船主借口需要修整，拖延了十多天仍未开行。李鸿章在致曾国藩的信中忧愤地写道：“洋人横戾，断不能操纵由我！”“亦无如何也！”

咸同之交，洋枪队（不久改名常胜军）统领华尔及其胞弟在上海开设华尔洋行，经营军火，谋取暴利。他们一面向沪方出售废旧轮船，一面利用“代管”的方式，图谋将中方轮船据为己有。同治三年八月，华尔试图用同样的方式骗取威林密、吧吡二船。他对李鸿章说：“外国人非中国官所能知，所能管。”同时提出：“今抚台若将威林密、吧吡等船责成我管，听你调度，包管无人敢于掣肘。”李鸿章认为可以依靠华尔的势力压服洋人，于是请求曾国藩令华尔兼管威林密、吧吡二船，“到皖由师门调派，在沪由鸿章调派”“每船委一委员，专司传谕照料”。曾国藩苦于无法正常调度威林密号，只好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复李鸿章：“威林密、吧吡二船，即日当札华尔副将经营。”

幸好此后不久，华尔即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击毙，白齐文接任常胜军统领。由于白齐文个性乖张，行事张狂，同治元年十一月，曾国藩令李鸿章索回了轮船的管辖权，将其交由淮军将领程廷杰管理。

威林密号的停撤变卖

曾国藩幕僚薛福成在同治七年（1868）日记中曾载：“威林密船身虽大，已历廿余年。”因此曾国藩购买之时，威林密号已经是至少十余年的旧船了。因为是二手船，威林密号问题颇多，经常在途中损坏，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在运送兵勇途中又遭到一艘外国兵船的碰撞，受损严重，而对方在赔偿修理的过程中又只知一味塞责，敷衍了事，致使轮船更是不堪使用，遭遇大风等恶劣天气甚至无法航行。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威林密号从上海驶往金陵的途中遇到大风，只能靠岸避风，短短的行程竟走了十天时间。

同治六年（1867）以后，为了防止迟滞误事，威林密号专用于在上海和金陵之间解运军饷。但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期间，考虑到“威林密轮船年老腐朽，一遇风涛，时有沉散之虞，若以装解数十万巨饷，诚难放心。”再加上该船使用费用较高，因此将威林密号停撤变卖。